

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问题探析

史勇

1956年4月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和革命文物遗迹进行普遍调查工作,在已知不可移动文物和普查新发现文物基础上,由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核定公布文物保护单位,并择其重要者报请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自此拉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全国文物普查(简称“一普”)的序幕。本文拟在现有资料基础上,围绕起止时间、成果统计、经验总结、性质辨析四个方面,对“一普”关键问题作简要探析,为深化当代中国文物普查史研究抛砖引玉。

关于“一普”起止时间

国务院《通知》并未明确规定“一普”的起止时间和标准时点,各省市普查工作启动与结束时间因此各不相同。如山西省普查工作于1956年4月启动,江苏省普查工作于1956年8月启动,山东省普查工作于1956年10月启动,1957年6月结束,青海省普查工作于1957年3月启动,陕西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3月启动,11月结束,甘肃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4月启动,福建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4月启动,12月结束,湖南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6月启动,8月结束,浙江省普查工作于1958年8月启动,北京市普查工作于1959年10月结束,黑龙江、吉林等省普查工作持续至1960年上半年。吉林省于1960年9月23日至26日召开文物普查总结会,此后未见关于“一普”的后续报道。故可推定“一普”于1956年4月初启动,1960年9月下旬基本结束,历时四年半。

关于“一普”成果统计

“一普”成果当时并未由国家层面统一发布。根据《文物参考资料》《文物》《考古通讯》等刊物所截文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文物博物馆事业纪事(1949—1999)》及相关省市文物志记载,目前有普查成果存世的共17个省市。

9个省市普查成果有分类统计。分别是:北京市(寺庙2666座、古建筑616处、古墓葬700处、石刻3774处、革命遗址36处、古遗址51处、艺术文物124项、其他文物93项,合计8060处);上海市(寺庙46座、会馆公所19所、祠堂4处、古墓葬5座、石碑和石坊20处、传统民居300幢,合计394处);山东省(古遗址和革命旧址1008处、古墓葬4805处、古建筑863处、石刻1698处,合计8374处);山西省(古遗址420处、古墓葬513座、古建筑1043处、石刻1181处,合计3157处);河北省(古墓葬1330座、古遗址1005处、古建筑3937处,合计6272处);河南省(古遗址531处、古墓葬466座、古建筑570处、碑碣635通、石刻造像95处、革命旧址36处,合计2333处);江苏省(古遗址318处、古墓葬277座、古建筑136处,其他古遗址312处,合计1043处);湖南省(古遗址217处、古墓葬573座、古建筑564处、石刻碑记178处、革命遗迹60处,合计1592处);陕西省(古遗址1188处、古墓葬3663座、石刻2771处、革命旧址20处,合

计7642处)。

8个省(区)普查成果仅有不可移动文物总数量或部分类型文物数量。分别是:甘肃省(1000余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286处);安徽省(近1000处);福建省(2179处);浙江省(800余处);广东省(1191处);吉林省(古遗址和革命遗迹1023处);江西省(革命旧址和遗迹1523处)。

综上,根据现存“一普”成果资料统计,当时全国17个省(区、市)共调查登录不可移动文物47869处;其中14个省(市)不可移动文物数量超过千处,排名前五的文物大省(市)依次为:山东省、北京市、陕西省、河北省、山西省。虽然此为不完全统计,只能大略勾勒“一普”成果之概貌,有的省份“一普”成果需待档案资料深入挖掘公布,但基于普查数据依然可以大致掌握当年全国不可移动文物家底及分布总体情况,特别是传统文物大省(市)的“江湖地位”在60多年前即已基本确定座次。

需要指出的是,“一普”在各地的落实情况并不均衡,有的省(市)实现了普查全覆盖,有的省则只对文物资源富集地区进行普查,又如青海省普查工作主要集中于西宁、民和等传统农业区,对于牧业区则选取重点文物调查。因此,完成“一普”工作的部分省份,其普查成果不一定全面完整地反映本省不可移动文物实际家底。此外,“一普”的另一个成果是核定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普查工作逐步开展,至1956年底,全国公布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572处;至1957年底,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增至6726处;1959年,湖南省、青海省、上海市、山西省、江西省、江苏省先后公布共计1421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一普”收官,全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8147处。还需要指出的是,“一普”启动之初各地公布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部分系根据地方志记载直接公布,经实地普查复核,从中挤出不少“水分”,在后续批次保单单位名录中进行了调整或重新公布。

关于“一普”经验总结

“一普”属于新中国文物保护领域开创性的工作,各地在“省自为战”的同时,因地制宜摸索出了适合本地区实际的文物普查经验,既有共同点又各具特色。

首先是开展试点。文化部文物管理局与山西省文化局合组文物普查试验工作队,于1956年4月初至5月底在晋南曲沃、闻喜、安邑、夏县、长治、高平、晋城7县开展试点,以期为全国文物普查取得经验,广东、河北、福建、浙江、湖北、陕西、江苏、山东、江西等省均派员参加试点工作。此后,各省纷纷在本省开展普查试点,如湖北省试点为襄阳地区,江西省试点为上饶专区,河南省开封专区试点为荥阳县,江苏省试点为镇江、扬州、泰州、南通、常熟、苏州6市。其次是培训干部。如山东省采取以会代训形式,河北、河南、陕西、湖北、福建等省通过举办文物讲习会或短期学习班,辅以田野调查实习,培训普查力量。第三是发动群众,各地通过座谈会、展览等形式宣讲文物

法令和普查政策;河北省在普查中访问60岁以上农民1100余人次,福建省南平专区普查队52天内召开群众座谈会199次,获得大量文物线索。

各省在“一普”中各有“高招”。有的省协调地方高校参与普查工作,广东省“一普”得到中科院广州分院、中山大学、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华南工学院建筑系的全力协助。吉林大学历史系三年级学生57人,在指导教师带领下,协助省文管会和省博物馆赴磐石、敦化、农安等县开展以古遗址和东北抗联革命遗迹为重点的文物普查。有的省普查记录档案质量较高,成为全国典型。辽宁省鞍山市按照历史艺术价值将千山风景区内28处古建筑分为甲乙丙丁四级,记录档案包括概述、历史沿革、现状、景物、平面图及照片;辽阳县普查发现的8处不可移动文物均详细绘制平面图和速写图并附有简要文字说明。吉林省四平专区行署每普查一地即填写记录表格并附地形草图和器物实测图,有的省总结出接地气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之谈。山东省即墨县普查办归纳出“四边”(边宣传、边访问、边检查、边登记)、“三勤”(腿勤、嘴勤、手勤)、“两抓”(抓重点、抓发动)普查工作法;河北省邯郸市普查组总结出“靠山找石窟、靠河找遗址”的经验和“三不”(不随便下结论、不粗枝大叶、不妨碍群众生产)的普查原则;江苏省普查组结合江南地区自然环境,总结出“秋末至春初,草木枯萎,遗迹暴露地面,适宜做田野普查;春夏、夏秋之交,不适宜田野普查,可作城市与名胜古迹调查”的经验。河北省唐山专区普查组亦指出,普查工作注意季节性,以一、四季度为宜,春耕或夏收时节不利于古遗址墓葬调查,同时应尊重群众风俗习惯。

关于“一普”性质辨析

就狭义而言,根据国务院《通知》要求,“一普”对象主要是不可移动文物。但从现有资料考察,相关省份在实践中也顺便开展了可移动文物调查,许多地方还出现了群众踊跃上交和捐献可移动文物的现象。“一普”过程中,陕西省收集陶器15万件、铜器6500余件、铁器3600余件、字画1000余件、革命文物1800余件、其他文物3万余件;吉林省征集和采集可移动文物7480件,其中较完好者700余件;山东省发现书画、陶瓷、铜器23066件;山西省征集革命文物236件;广东省征集革命文物326件;河北省征集可移动文物12967件;湖南省征集可移动文物14620件。这些可移动文物作为“一普”的副产品抑或意外收获,为各省建立博物馆(纪念馆)提供了一定藏品基础。此外,“一普”并非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唯一的文物普查项目,当时与其同步开展的还有相关省份的常态化革命文物普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以及配合基本建设开展的专项文物普查,如文物部门配合新疆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曾对南北疆相关古遗址、古城址、冶铁遗址、岩画、石刻等不可移动文物进行过普查并征集可移动文物2973件,浙江省文管会对畚族群众聚居区的民俗文物和革命文物进行过专项调查。这些文物普查工作与“一普”在

发挥博物馆展览的“非物性”优势

张露胜 徐文辰



博物馆展览的职能是展示和传播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和多彩环境,旨在承载过去、塑造现在、昭示未来。数字时代,我们对传统“物”的依赖在不断降低,社交、购物、工作等传统与“物”打交道的领域日益被数字媒介所取代,在数字世界急速冲击一切的时候,作为“物”的载体的博物馆反而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博物馆热”成为一种全球化的文化现象。从1683年阿希莫林博物馆在牛津大学对外开放以来,当代博物馆正在经历一个不同寻常的时期,在保持一贯的收藏研究展示职能之外,某些“非物”因素正吸引着观众去关注博物馆。他们关注的可能是精美的文物、展品背后的故事、民族的文化传统甚至社会的集体记忆等内容。博物馆致力于保存人类的见证物,其收藏的边界正在被打破,具有“非物”特征的展项正愈加成为博物馆的明星,使博物馆展现出超越文物本身的价值。

展览的“非物性”概念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认为,“物”是世界的本质和人的本性,构成了西方的哲学基础。博物馆作为“研究、收藏、保护、阐释和展示物质与非物质遗产”的场所,具有突出的“物”的属性,以文物为核心建构了博物馆的各项职能。博物馆展览同样如此,它依托收藏的文物及其他展品组织展览内容,并通过时间、因果、嵌套等叙事手法呈现出来。这种“物”的概念随着陈理念和技术进步不断发生变化,在“物”的基础上衍生出诸多对展览起到重要影响的“非物”因素。展览并非“物”的堆积,不是一本考古报告或者是一间设备库房,意境的渲染和价值的阐释成为展览现代性的重要特征,观众也乐见更多跨领域的新理念、新技术去突出展示主旨,烘托展示氛围、深掘藏品内涵。因此,“非物性(Immateriality)”成为博物馆展览的一个核心理念,去表达基于实体的抽象性信息以及脱离实体的文化、价值、情感等因素。当“非物”从“物”的属性中独立出来,我们可以看清当代展览的不同寻常之处,并运用它将实物、智慧和情感连接起来塑造面向未来的博物馆。

“物”与“非物”是一对辩证体,展览“非物性”概念取决于“物”的范畴。狭义的“物”可以认为是文物、资料和辅助展品等。一方面,展览中的“非物性”因素包括有介质承载的展示部分,如图像、音乐、影像以及虚拟现实等内容,某个展项的意图、情感或某项非遗中的技法、传统等信息通过固态或动态影像的方式创作出来,以投影或屏显等数媒方式向观众展示。修复的老照片、影像或有价值的口述史等图像或影像成为博物馆的展品,甚至基于展品创作的数字艺术作品本身就可以脱

离实物成为独立的展览类型。观众对此类“非物性”因素有明确的观察对象去获取展示的信息。另一方面,某些“非物性”因素没有明确的介质去承载,观众找不到一个或数个特定的对象去获取展示意图,对于展览的主旨、价值体系、情感因素、社会影响等信息,观众可能需要浏览整个展览叙事之后才能有所收获。虽然展览预设了这些信息,希望给予观众某种特定的态度,但不同的观者对信息的理解仍然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如果从宏观视角定义“物”的范畴,那么博物馆展览中使用的所有物质都是“物”的范畴。展览中的“非物性”因素都需要借助“物”为载体来呈现,“非物”与“物”的关系更加紧密。

展览“非物性”特征的构建

美国博物馆联盟专家委员会《博物馆展览标准及卓越展览标志》认为“当一个展览能够以实物、智慧和情感吸引正在体验它的人们,它就是一个成功的展览”。当代博物馆的价值不仅在于呈现历史遗存,更重要的是建立文物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联,以当代视角阐释历史之于现代的意义,唤醒民族的集体记忆和文化认同。因此,“非物性”因素对博物馆意义重大,展览需要从理念和实践两个层面去理解和应用“非物性”。在各学科领域“叙事转向”的影响下,博物馆展览开始以叙事逻辑构建展览的语境和空间,文物被赋予了佐证事件以及串联故事的结构作用,文物及其背后的故事成为展览叙事链条中的关键环节。因此,展览借助叙事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表达历史语境、情感因素、学术观点等“非物性”因素,叙事在表达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愈加明显。山东博物馆“海岱日新——山东历史文化陈列”(以下简称“海岱日新”)的史前部分讲述了从人类起源到三代之前的地方史,岳石文化时代与二里头文化相当,具有鲜明的山东地域文化特色,在叙事上如何衔接新石器时代与青铜时代是一个难点。一件龙山文化晚期的丁公陶文因为其时代的衔接性和对古代文字的重要意义成为两个时代的重要佐证物,有效串联起整个史前时期的叙事脉络。

博物馆收藏的历史遗存是为了回顾过去,展览作为多学科融合的艺术载体则是面向未来,我们站在当下用“非物性”连接不同的时代。“非物性”的核心是对“人”的关注,在阐释“物”的基础上尝试去连接不同时代的“人”,通过实物的选择与阐释连接了过去和现代的人,又通过叙事将今天之人联系起来,将历史的观念与当下的情感、价值形成了一以贯之的延续,以至未来。“海岱日新”展览的商周部分突出了“礼”对于

齐鲁文化的重要作用,崇仁重礼的时代背景孕育了孔子及儒家思想,展览在面临缺乏相应实物资料的困难下,创新运用“非物性”的理念,以场景复原结合虚拟影像、真人表演的方式再造了孔子杏坛讲学的历史场景,当观众踏入这个环绕的虚拟场域就成为两千年前孔子弟子的一员,古人与今人、历史与科技因为“非物”融为一体。

对“非物性”应用的思考

展览中“非物性”的实践很大部分是通过数媒和场景实现的,如何合理、适当地使用这一类表现方式,避免出现低质化、同质化、过度化等问题?“海岱日新”展览的史前部分为展示后李文化西河遗址的陶釜与三足石灶的使用原理,一方面通过支架系统将两者结合,展示釜与灶在当时的空间关系;另一方面在文物背后以短焦投影的方式展示釜灶煮食物的剖面特征。这种文物与数媒密切结合的展览方式,并没有使技术设备对展览叙事产生干涉和打破作用,反而以适当“隐身”的方式诠释了文物在展览叙事中的意义。

“海岱日新”展览的宋元明清部分展出一艘体型庞大的明代梁山古船,为了表现京杭大运河山东段舟楫往来的历史特征和自然风光,展览搭建了一个等大的船首,观众伫立船头,在五面屏中浏览大运河山东段的自然风光和历史遗迹。在兼顾文物保护和场景体验的前提下,虚拟影片中内置了丰富的场景和情节,观众在观展过程中既体验了明代漕运的盛况,又领略了山东明清时期繁荣、富足展示的展示主,是“物”与“非物”的有力结合。

当然,过度与适当属于人的主观性感受,不同类别的展览需要不同比例的“非物性”展项,不同的受众群体对同一展项的态度也不尽相同。有些学者认为博物馆过多引入情景化设计会降低受众对文物本身的关注;年轻观众更喜欢现代化的展示方式,关注展品故事性和展览的叙事性;游客类观众可能将博物馆作为地域旅游的一个目的地,在网红场景拍照是他们进入博物馆的主要目的。目前博物馆缺乏较为专业的展览评价体系,用于评估展览数字展项的合理程度和绝大部分观众的参观体验。

博物馆展览的“非物性”是叙事逻辑、情感因素、历史价值等意识形态方面以及非物质信息的数字化展感等技术方面的整体性概念。博物馆需要利用、发挥好这一理念的优势,更好地统筹展览结构、构建展览叙事,设计数字展项等工作,提升博物馆展览质量,推动博物馆高质量发展。

圆明园兽首走进鄂尔多斯市博物院



12月23日,由鄂尔多斯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鄂尔多斯市博物院与保利艺术博物馆、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管理处联合承办的“盛世回归——圆明园国宝兽首暨清官珍宝展”在鄂尔多斯市博物院开幕,展览特别遴选由圆明园国宝兽首领衔的70余件(组)17至18世纪清官珍品,涵盖瓷器、玉器、家具、丝织品等品类。

展览主要分为5个单元:

“天子宸翰”单元遴选乾隆御笔题写给股肱之臣英廉的楷书“斗牛介景”,以表现乾隆与包括英廉在内的君臣相携之情;亦有以缂丝技艺呈现的皇室贺寿对联。

“怀玉比德”单元以清官所使用的玉器为主,有文房所用的笔筒、水洗、水盂,也有赏赐大臣喝三清茶使用的玉碗,还有蒙古的花觥、方鼎等。

“御容珍瓷”单元以清官所使用的瓷器为主,清代瓷器以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最,部分瓷器在明代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创新。

“万园之园”单元以圆明园这座享誉世界的历史名园为主线,以多媒体视频加文物的展现方式,为观众营造“古今对话”的沉浸式体验。

“国宝归来”单元围绕清代圆明园海晏堂“生肖与计时”的设计主题,展示了作为水力钟喷泉口的十二生肖之牛首、猪首、虎首、猴首、马首(仿制品)、鼠首(复制品)、兔首(复制品)七个铜兽首。

回望历史,纵览元之锦绣蓬勃。从百年前的风雨如晦,到当今的海晏河清,“盛世回归——圆明园国宝兽首暨清官珍宝展”展现了文物所承载的丰厚历史文化。(曹植森 呼政)